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第 13 卷  
第 1 期  
(总第 46 期)

主编：闵维方；副主编：丁小浩 岳昌君；

编辑：孙冰玉

## 政治权力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丁小浩 翁秋怡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

**摘要：**本文利用 CFPS2012 年的数据，使用父母的职业权力指数衡量家庭的政治权力，探讨政治权力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政治权力具有经济价值，在初级教育阶段比高级教育阶段的作用更加显著，在行政层级较低的区域比层级高的区域作用更加明显。

**关键词：**家庭教育支出 家庭收入 政治权力

### 一、引言

家庭教育支出是影响教育机会分布的重要因素，因此家庭教育支出的决定因素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前人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家庭经济状况入手的。这些文献多将家庭收入（或者家庭支出）作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解释变量，分析教育支出的曲线形态以及教育支出的弹性特征。例如，Benson(1961)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推断，教育的收入弹性随家庭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具体而言，中等收入家庭的教育收入弹性应该大于 1，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收入弹性应该在 0 和 1 之间。也就是说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对教育的恩格尔曲线的型态是敏感的，收入弹性应该是家庭收入的非单调函数。有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教育支出相对于家庭总收入而言是缺乏弹性的，迟巍（2012）使用 2007 年国家统计局城市经济调查总队的数据计算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仅为 0.332。

另外的一些研究除关注家庭经济资本外，还考虑了家庭的非经济背景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等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例如，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的社会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所在地区及宗教信仰、孩子的数量、子女就读的教育阶段、城乡背景等因素也对家庭教育支出影响较大（楚红丽，2007；涂瑞珍，2009）。还有研究表明，户籍管制放松对家庭教育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家庭收入，放松户籍管制将会降低低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但会提高高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贺京同，2014）；政府教育支出对于居民教育总支出有着明显的“替代效应”，收入越低的群体其替代性越强（吴强，2011），对于私立学校学杂费和择校费没有影响（袁成等，2013）。此外，居民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投资教育收益的不确定性会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张锦华等，2014）。

但是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经验感受，我们都有理由认为这些现有的研究所考虑的因素在理解中国家庭教育支出行为方面依然是有局限性的。在中国，接受优质教育已成为家长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的激烈竞争。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是，政府机关及相关企事业单位通过赞助钱或物等方式，与知名中小学建立“共建”关系，使其子弟名正言顺地进入优质学校。而这

种择校行为的经济成本往往是由公共财政负担的,并不是由择校者家庭承担的。也就是说,家庭的经济背景与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高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家庭具有强的支付能力,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从而让子女接受优质教育。另一方面,高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家庭因有较大可能性通过权力择校,并且不需要付出更多的家庭教育支出,就可以让子女接受到优质教育。即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力寻租,权力择校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的不公,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叶晓阳(2012)的研究是中国鲜有的讨论家庭政治资本对择校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他使用党员和干部身份作为政治资本的代理变量,发现父母的政治资本帮助子女进入到了更好的学校。拥有更高的政治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择校费支出。叶晓阳的研究在角度上是独到并有趣的。本文作者认为首先,党员和干部身份固然在资源分配中占有优势,但会因其职业和岗位等特征的不同而存在非常大的异质性,因此对于研究政治资本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第二,政治资本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可以交钱择校方面,一些具有较高政治资本的家庭常常可以通过少交钱甚至不交钱就让子女通过择校或者多种非择校途径接受到优质教育,因此仅仅研究政治资本与择校费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教育机会分布的决定因素也是有局限性的;第三,政治资本的作用可能因教育层级而存在差异。进一步说,在教育的初级阶段(例如幼儿园、小学),由于孩子的学业能力并没有充分显现或者差别不大,较少地能作为入学竞争的决定因素,因此政治资本会在入学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进入较高阶段的教育层级后,孩子的学业成绩分化严重,更容易被作为人力资本的信号参与入学竞争,因此会使得家庭政治资本的作用弱化;第四,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以及教育资源的分布在省会城市、大中城市与县级及其以下地域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政治资本的作用方式和程度会因学校所在地的差异存在差异。第三和第四两点在叶晓阳的研究中并没有受到关注。本文旨在研究中国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特别关注除家庭收入水平之外,父母职业的政治权力对教育支出的影响,以期为认识理解中国社会教育资源配置状况提供实证的依据。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并进行检验:

假设一、家庭的政治权力是有经济价值的。在控制了家庭的经济能力、学生的学业状况和其他家庭背景等因素后,政治权力可以降低家庭教育支出。

假设二、家庭政治权力的经济价值因不同的教育阶段而不同。在控制了家庭的经济能力、学生的学业状况和其他家庭背景等因素后,政治权力在初级教育阶段比高级教育阶段的作用更加显著。

假设三、家庭政治权力的经济价值因不同的区域而不同。在控制了家庭的经济能力、学生的学业状况和其他家庭背景等因素后,政治权力在行政层级较低的区域比层级高的区域作用更加明显。

## 二、研究设计、数据和变量

### (一)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该项目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数据收集了受访家庭的各项收入和支出情况、家庭成员的教育信息、家庭背景情况等,对于研究家庭教育支出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CFPS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2012年对2010年基线调查所界定的57,155名基因成员及其所在家庭进行追踪,具有全国代表性。本文选取2012年调查时就读于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样本,有效样本量为1939。

### (二) 变量

中国居民的家庭教育支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 学杂费、书本费等费用;2. 为了接受

更高质量的教育而花费的择校费; 3. 为了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而投入的兴趣班、家教等课外补习费用 (丁小浩, 薛海平 2005)。本文的因变量为不含课外补习费的家庭教育支出。课外补习是完全由市场化途径决定的校外教育资源, 这种资源的购买是市场导向的, 我们在此不多做讨论。扣除了课外补习费用的家庭教育支出主要购买的是正规学校的教育资源, 这部分费用更能体现家庭对公共教育资源的支付情况, 反映国家教育资源的配置的差异。

自变量包括家庭的经济能力、政治权力、学生的学业状况和其他家庭背景。家庭的经济能力用家庭总支出衡量。政治权力用父母的职业权力指数衡量, 权力指数体现具体职业的影响力和帮别人办事能力的高低, 能够反映家庭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和权力大小。根据尉建文、赵延东 (2011) 的研究, 权力指数与职业声望指数是不一样的。本文借鉴其权力指数的结果, 将权力指数在 50 以上的职业定义为具有“高政治权力”, 权力指数在 20-50 的职业具有“中等政治权力”, 权力指数在 20 以下的职业“低政治权力”, 我们着重关注高政治权力与其他政治权力的差异。

学生的学业状况包括所在的教育阶段、学校质量和学生学习成绩。其中, 教育阶段共包含三级, 我们设置初中和高中两个虚拟变量, 小学为参照组。学校质量通过“所在学校是否为重点/示范学校”衡量, 为二分变量。学习成绩划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 分别代表班级排名的前 10%、11%-25%、中间 50% 和后 25%。

学生的家庭背景包含在读子女个数、家庭所在地区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中在读子女数越多, 家庭教育支出的经济负担越大。在读子女数按家庭户计算, 家庭户必须是独立的经济单元, 三代同住并且是同一经济体的大家庭为一个家庭户。家庭所在地区包含城乡变量和地区变量,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 我们未按照户籍所在地划分城乡, 而是依据学生的就读所在地, 将“省会城市”和“一般城市”归为城市, “县城”和“乡镇”归为非城市, 这一分类能更好地反映城乡教育支出的差异; 地区主要考察家庭是否在东部地区, 为二分变量。各个变量的基本描述特征见表 1。

表 1 自变量和因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家庭教育支出的对数	1631	7.410	1.337	10.820	2.996
家庭支出对数	1644	10.599	0.768	13.839	8.049
父母平均教育年限	1896	8.182	3.690	20.500	0
家庭中在读子女个数	1939	1.392	0.652	8	1
学生成绩等级	1830	2.914	0.890	4.000	1.000

续: 自变量和因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频数	比例	变量	频数	比例
高政治权力	333	17.17%	重点学校	553	30.02%
中等政治权力	135	6.96%	普通学校	1289	69.98%
低政治权力	1471	75.86%	城市地区	693	37.36%
小学	990	51.06%	县城/乡镇	1162	62.64%
初中	505	26.04%	东部地区	878	45.28%
高中	444	22.90%	中/西部地区	1061	54.72%

### 三、实证分析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探讨家庭的政治权力、经济能力及其他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建立模型如下:

$$\ln z_e = \alpha + \beta_0 \ln z + D_1 + f(x_1, \dots, x_n); \quad (1)$$

其中,  $\ln z_e$  为家庭教育支出的对数(不含补习费),  $\ln z$  为家庭总支出的对数,  $D_1$  为家庭高政治权力的虚拟变量,  $x$  为其他控制变量, 包括初中、高中、重点学校、学习成绩、家庭子女数、东部地区、城市和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此外, 在不同的教育阶段, 入学招生体制和教育费用分担机制存在明显的不同, 家庭政治权力的作用可能会由此而产生差异。具体地, 小学和初中为义务教育阶段, 不收学费杂费, 国家承担主要的教育费用; 而高中为非义务教育阶段, 由国家和家庭共同承担教育费用。由此, 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教育阶段与家庭政治权力交互项, 调整后的模型为:

$$\ln z_e = \alpha + \beta_0 \ln z + D_1 + D_1 * junsch + D_1 * higsch + f(x_1, \dots, x_n); \quad (2)$$

$D_1 * junsch$  为高政治权力与初中的交互项,  $D_1 * higsch$  为高政治权力与高中的交互项。

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按不同的教育阶段做分样本回归。

表2汇报了全样本和分教育阶段的回归结果。全样本回归中, 控制了教育阶段与政治权力的交互作用后, 家庭政治权力的作用显著。其中, 两个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 表明政治权力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有显著的差异。具体来看, 小学阶段家庭政治权力的作用显著为负, 拥有高政治权力家庭的教育支出比其他家庭少31% ( $e^{-0.371} - 1$ ); 初中和高中阶段政治权力的作用为正, 初中阶段高政治权力家庭的教育支出比其他家庭高4.5% ( $e^{0.415-0.371} - 1$ ), 高中阶段高政治权力家庭的教育支出高1.8% ( $e^{0.389-0.371} - 1$ ), 但在这个模型中初高中阶段的政治权力的显著性水平无法确定。分样本回归中, 我们发现了一致的结果, 政治权力的作用在不同教育阶段有明显差别, 小学显著为负, 初中和高中为正, 但不显著, 也就是说, 在较低的教育层级, 家庭的政治权力有着显著的经济功能, 但随着教育层级的提高, 政治权力的作用在减弱。

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支出的弹性为0.463, 意味着家庭支出提高1%, 家庭教育支出提高0.463%, 家庭的经济能力越强, 家庭的教育支出显著越高。子女就读的教育阶段越高, 家庭的教育支出显著地增加, 比较有趣的是, 学习成绩提高一个等级, 家庭教育支出需要增加0.07%。在读的子女人数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为负, 与我们预期相符, 即家庭中在读的子女数越多, 对家庭教育资源的稀释作用越强。学生在城市就读比在非城市就读的费用支出更高, 但东部和非东部地区的差异不显著。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影响也不显著。

表2 政治权力与家庭教育支出

变量	因变量: 家庭教育支出对数				
	全样本	小学	初中	高中	
家庭支出对数	0.463*** (0.0439)	0.463*** (0.0438)	0.420*** (0.0619)	0.491*** (0.0926)	0.538*** (0.0809)
高政治权力	-0.139 (0.0881)	-0.371*** (0.133)	-0.404*** (0.140)	0.0824 (0.195)	0.0173 (0.126)
高政治权力*高中		0.389** (0.196)			
高政治权力*初中		0.415* (0.218)			
初中	0.461***	0.407***			

	(0.0772)	(0.0828)			
高中	1.360***	1.287***			
	(0.0865)	(0.0956)			
重点学校	0.0160	0.0200	-0.0779	0.275*	-0.0981
	(0.0708)	(0.0708)	(0.108)	(0.151)	(0.112)
学习成绩	0.0691*	0.0726**	0.0916*	0.0385	0.0690
	(0.0358)	(0.0358)	(0.0521)	(0.0731)	(0.0648)
在读子女数	-0.292***	-0.294***	-0.383***	-0.299***	-0.141
	(0.0532)	(0.0532)	(0.0808)	(0.109)	(0.0875)
城市	0.200***	0.204***	0.345***	0.0842	0.0612
	(0.0720)	(0.0719)	(0.106)	(0.159)	(0.119)
东部地区	-0.0760	-0.0798	-0.112	0.0115	-0.0975
	(0.0635)	(0.0634)	(0.0908)	(0.138)	(0.112)
父母平均教育年限	0.00234	0.00381	0.0115	-0.0133	0.0109
	(0.00990)	(0.00992)	(0.0148)	(0.0208)	(0.0170)
常数	2.185***	2.196***	2.656***	2.454**	2.576***
	(0.467)	(0.467)	(0.656)	(0.964)	(0.894)
观测值	1,261	1,261	667	309	285
R-squared	0.301	0.304	0.155	0.148	0.180

#### 四、结论

本文利用 CFPS2012 年的数据讨论了家庭的政治权力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利用父母的职业权力指数衡量家庭的政治权力,结果表明,初级教育阶段比高级教育阶段的作用更加显著。在小学阶段,高政治权力的家庭教育支出显著低于其他家庭,政治权力一定程度上具有经济功能。

本文的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一和假设二,家庭的政治权力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但其作用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具有异质性。在较低的教育层级,学生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入学的筛选机制与家庭经济条件更为密切,家庭的政治权力更容易发挥作用,使得子女以较低代价的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在较高的教育层次,学生的人力资本水平有所提高,入学的筛选往往伴随着对学生能力的考察,家庭的政治权利发挥的作用相应地会变小。

尽管政治权力的作用主要在低教育阶段,但在我们经验看来,这种影响对后续的教育阶段往往具有延续性。在优质教育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经济能力依然是直接影响,而政治权力往往是通过学校选择而间接地发挥作用。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导致家庭拥有的教育资源不均等,政治资源的差异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且后者所带来的不平等往往更加隐性。具有更高政治权力的家庭的子女通过不公平的分配机制以更低的代价获取了更多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因此在目前公共教育资源和市场教育资源的双重配置机制下,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均等性面临严重的挑战。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研究尚未呈现和分析假设三的结果。此外,本文作者正在分析学前教育阶段数据的结果,将与假设三的结果一并在后续的文章中补充完善。

### 参考文献:

- 迟巍, 钱晓焯, 吴斌珍.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负担研究[J]. 清华教育研究, 2012(6):76-82
- 楚红丽, 赵树贤. 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述评[J]. 教育学报, 2006(12):60-66
- 丁小浩, 薛海平.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义务教育支出差异性研究[J]. 教育与经济, 2005, (4):39-44
- 贺京同, 廖直东, 宗振利. 户籍管制放松、就读地选择与进城家庭教育支出[J]. 南方人口, 2014(1):47-58
- 涂瑞珍, 林荣日. 上海城乡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及教育负担状况的调查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 2009(21):21-25
- 尉建文, 赵延东. “权力还是声望?—社会资本测量的争论与验证” [J]. 社会学研究, 2011(3):64-83
- 吴强. 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分析—以湖北省城镇居民为例[J]. 教育研究, 2011(1):55-60
- 袁诚, 张磊, 曾颖. 地方教育投入对城镇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影响—对我国城镇家庭动态重复截面数据的一个估计[J]. 经济学动态, 2013(3):29-35
- 叶晓阳. “以权择校”: 父母政治资本与子女择校[J]. 世界经济文汇, 2012(4):52-73
- 张锦华, 杨晖, 沈亚芳, 韩阳. 不确定性对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倾向的影响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14(12):83-88
- Benson. C. S. (1961). The Economics of Public Educ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